

理论与实践

探索黄河流域“绿”“富”共赢

郝宪印

黄河流域横跨我国东中西部,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也是人口活动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在国家发展大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实地考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development 情况。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科学推进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一系列重要举措接续落地。如何在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黄河流域实现“绿”“富”共赢,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践中需要探索的重要课题。

黄河流域实现“绿”“富”共赢意义重大

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现黄河流域“绿”“富”共赢,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黄河流域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为经济社会发展筑牢根基。黄河流域构成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是连接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华北平原的生态廊道,拥有三江源、祁连山等多个国家公园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同时也是我国生态脆弱区分布面积最大、脆弱生态类型最多、生态脆弱性表现最明显的区域之一。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地带,若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解决不好,势必会影响我国生态状况稳定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夯实黄河流域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将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筑牢根基。

黄河流域实现“绿”“富”共赢能为流域治理贡献宝贵经验。保护好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促进沿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在推进“绿”“富”共赢上下功夫,既是更好协调黄河水沙关系、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保障黄河安澜的迫切需要,也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防范和化解生态安全风险的

现实举措。特别要看到,在推进“绿”“富”共赢的过程中,我们还将进一步探索新方法新路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更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创造力,为我国流域治理贡献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

黄河流域实现“绿”“富”共赢将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注入新动力。黄河流域西接昆仑、北抵阴山、南倚秦岭、东临渤海,几千年来一直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但也要看到,近年来,黄河流域生态脆弱,水资源十分短缺,水土流失严重,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弱,且沿黄各省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较为突出。如果我们能以实现“绿”“富”共赢为指引,紧密结合黄河流域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条件,以生态保护为前提优化调整区域经济和生产力布局,促进上中下游各地区合理分工,提升沿黄城市群、都市圈发展水平,夯实流域高质量发展基础,突出流域高质量发展特色、增强流域高质量发展动力,将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进一步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供助力。

“绿”“富”共赢蕴含辩证思维

更好推动黄河流域实现“绿”“富”共赢,进一步认识“绿”“富”共赢蕴含的辩证思维。**统筹保护与发展。**生态相对脆弱和发展相对滞后是黄河流域当前存在的短板,也是一对互为因果的矛盾的两个方面。若不能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将制约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正确政绩观,准确把握保护和发展关系”“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遵循。在实践中,需将保护与发展统一到“绿”“富”共赢的协调发展轨道上来。**把握局部与全局。**黄河流域既是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也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社会系

统。黄河流域实现“绿”“富”共赢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必须把系统观念贯穿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全过程,把握好局部和全局的关系,增强一盘棋意识,在重大问题上以全局利益为重。既要 will 流域生态系统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又要充分考虑上中下游的生态差异,做到因地制宜;既要重视推动全流域高质量发展,又要突出各地比较优势,积极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发展路子;既要 will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置于同一个系统中协同推进,又要解决好不同领域的重点问题。

兼顾当前与长远。实现黄河流域“绿”“富”共赢,是一个需要接续奋斗的历史性任务。必须看到,黄河流域目前存在的发展短板和弱项是多年累积的结果,绝不是在短时间内能够成功化解的。对此,必须把握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放眼长远认真研究,克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思想,持续推进。既要抓可操作性和适用性,又要抓连续性和稳定性;既要只争朝夕、抓紧落实,又要坚持不懈、久久为功;既要承受短期阵痛、谋划长远利益,又要及时止损减亏、增益既得。

推进“绿”“富”共赢的现实路径

推动黄河流域“绿”“富”共赢,必须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客观现实和实际需要,以问题为导向,积极探索实现“绿”“富”共赢的现实路径。

一是以“水”保“绿”、以“绿”带“富”。黄河流域最大的矛盾是水资源短缺,最大的威胁是洪水。对此,在防范夏季突发洪水的同时,还要坚持量水而行、节水优先。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统筹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用水结构,用市场手段倒逼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推动用水方式由粗放低效向节约集约转变。一方面,要更加重视发挥市场机制对水资源配置的作用,探索生

态经济发展新模式,挖掘水资源和水生态的经济价值;另一方面,要遵循自然规律、创新治水路径,确保黄河安澜,夯实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水安全根基,把握好治水与致富的关系。

二是以空间优化推动“绿”“富”均衡。要以城市群为主要空间载体,进一步优化流域布局。关键是要严守生态红线,科学规划开发,形成生态与发展互补共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性循环。具体来看,应基于生态承载力集聚优质要素,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深化优势互补,强化生态功能区和农业主产区对可开发区的生态支撑和生产生活要素支持作用,促进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在空间维度的耦合发展。同时,加强城市群之间的协同,逐渐形成地域分明、特点鲜明、重点突出、责任清晰、有机统一的流域生态保护体系,积极促进生态合作向经济社会发展合作延伸。

三是以产业发展推动“绿”“富”协同。黄河流域以生态保护为前提的高质量发展需凸显绿色底色,让生态产业成为推动黄河流域“绿”“富”共赢的强大动力。要进一步做优做强农牧业,构建绿色引领、特色突出、资源互补、区际利益补偿机制健全的流域农业产业体系,加强流域农业科技合作,推动传统优势产业绿色转型;要以产业基础较强的地区为重点,搭建产供需有效对接、产业上中下游协同配合、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紧密衔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合作平台,推动产业体系升级和基础能力再造;要提高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对传统产业的渗透率,进一步推动黄河流域优势制造业绿色化、智能化、数字化,为实现“绿”“富”共赢注入动力。

(作者系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山东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

京津冀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吸纳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是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精心谋划、科学布局,确立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推动京津冀地区发展向着更加均衡、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方向迈进。作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领域。

近年来,面对发展改革的新形势新任务,京津冀地区紧抓协同发展的重大战略契机,积极转变发展方式,加速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三地协同创新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产业协同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

功能定位不断强化。京津冀地区牢牢抓住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这个“牛鼻子”,围绕北京的“四个中心”定位、天津的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等定位、河北的全国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等定位,着力调整优化城市布局 and 空间布局,有序开展产业承接转移和对接协作。目前,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为“高精尖”经济发展创造了空间,科技、信息、文化等领域“高精尖”产业新设市场主体占比从2013年的40.7%上升至2020年的60%。

结构布局持续优化。京津冀基于各自功能定位,初步形成了良好的区域分工格局。三地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完善生产力布局,以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带为导向,加快形成了分工合理、相互融合的产业格局。同时,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京津冀三地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北京对津冀地区溢出效应明显,区域创新驱动能力持续增强。截至2020年,北京输出到津冀的技术合同成交额累计超过1200亿元,中关村企业在津冀两地分支机构累计达8300多家,科技创新链加快形成。

基础保障不断增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京津冀地区持续推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和公共服务等重大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夯实产业协同发展的配套支撑体系。同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快推动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为产业协同发展不断夯实民生基础。

现实地看,京津冀地区发展形势整体良好。但也要看到,在产业协同发展方面还存在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一方面,京津冀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存在。北京科技创新资源密集、人才与资金充裕、服务业发展繁荣,产业多处于区域产业链中附加值较高的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环节,津冀地区产业则大都处于附加值相对较低的制造配套环节。同时,北京对周边地区的虹吸效应明显,辐射带动效应不足,三地产业发展梯度较大,产业良性互动有待加强。另一方面,区域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不足。由于区域内与高科技成果对接的产业化体系支撑不足,部分科技创新成果的价值实现受阻,存在科技创新成果落地转化难、产业竞争力不足、产业协同发展进程相对滞后等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作为我国区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京津冀地区需适应新形势、谋划新思路,推动产业协同走深走实,大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迈向更高水平。

第一,发挥三地优势,做优做强优势产业。三地产业发展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要进一步理顺三地产业发展链条,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避免同质化发展。

第二,加强互联互通,推进市场一体化。要推动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场。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促进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并向优势地区集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立足于推进人流、物流、信息流顺畅流动,促进要素市场一体化,继续推动交通一体化。

第三,坚持创新驱动,提升科技转化能力。要大力推动科学技术转化应用,充分释放北京的科技创新活力,大力推动津冀地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还要推动区域内重点产业链“补链”“强链”和“延链”,促进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深度融合,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执笔:叶堂林 王雪莹 刘越山)

自贸港建设需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王惠平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也是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新发展格局决不 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必须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在激烈国际竞争中的强大竞争力、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强大推动力。在这一过程中,海南自由贸易港需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在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等方面展现作为,不断增强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海南是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具有实施全面深化改革和试验最高水平开放政策的独特优势。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是党中央着眼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入研究、统筹考虑、科学谋划作出的战略决策。2020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启动。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公布,为建设高水平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推动形成更高层次对外开放新格局、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了法律保障。海南自贸易港建设推动至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

一是坚持对标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更大的逆风和回头浪。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是推进高水平开放、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根本要求,也是支持经济全球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行动。海南自贸易港建设始终坚持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建设,对标当今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主动适应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新趋势,充分学习借鉴国际自由贸易港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和制度安排。具体来看,在贸易自由便利、投资自由便利、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人员进出自由便利、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具体改革举措和制度安排,分尊重双边及多边贸易投资协定的成熟规则;加快与国际投资贸易规则接轨,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已经出台;探索“多规合一”下的“零审批”、负面清单制度等,加快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和公平开放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

二是积极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交汇点。海南面向东盟、毗邻粤港澳大湾区,独

特的区位优势使其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具备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交汇点的基础和条件。在建设自由贸易港的过程中,海南可进一步发挥在西部陆海新通道中的枢纽作用,积极吸引和配置全球资源。当前,海南已经在多个方面显示出优势。比如,国内外重要企业和机构已经开始在海南布局;离岛免税市场需求持续扩大;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实现医疗器械、医药、技术与国际同步,吸引了大批有医疗需求的人员来海南就医;通过建设海南国际教育创新品,吸引海外留学生到海南就读。与此同时,海南成为全球投资的“新热土”。2018年至2020年,海南全省实际利用外资规模连续3年翻番,总额超过海南设立经济特区30年总额的一半。

三是持续深化制度集成创新。“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促进生产要素自由便利流动,高质量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港”“要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成熟一项推出一项,行稳致远,久久为功”,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指明了海南自贸易港建设的方向和路径。近年来,海南既持续深化商品、服务、资金、人才等要素流动型开放,又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始终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目前,已先后发布13批123项制度创新案例,其中4项案例作为改革试点经验被

国务院要求向全国复制推广;全面推进“放管服”改革,推行园区极简审批,审批环节由70个减少到4个,审批时间压缩80%以上;推动涌现更多高质量、高标准、系统化、集成式制度创新成果,出台《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度集成创新行动方案(2020-2022年)》,积极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海南自由贸易港公平竞争条例》《海南自由贸易港社会信用条例》等出台……推动制度型开放已成为海南自由贸易港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建设的重要内容。

面向未来,海南自由贸易港需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进一步展现作为,做好压力测试,提升适应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能力,争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范例。当前,一方面要大力培育和发展数字贸易,充分发挥海南自贸易港发展服务贸易的优势,采取务实举措促进电子商务和服务贸易更好发展;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制度创新,充分用好海南具有的生态优势,做好生态修复和综合治理,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和生态的多样性,并在发展渔业、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优化环保争端解决机制、做好生态补偿等方面开展制度创新。此外,还要在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支持产业发展等方面下功夫,将海南自贸易港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作用发挥出来。

(作者系海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海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罗雨泽：

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同时要求“坚持多边主义,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动力、活力,需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要在复杂形势下保持利用外资稳定增长。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严峻,我国利用外资面临的环境也更趋复杂。在此背景下,我们要坚持做好自己的事情,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重点要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提升营商环境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水平,继续压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提升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推动重大外资项目加快落地。

第二,要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不断推进制度型开放。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

值链深刻调整,国际经贸规则面临重构,签署区域、多边和双边自贸协定成为积极应对复杂变化、应对风险挑战的重要抓手。我们需进一步适应开展高标准经贸协定谈判的要求,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将推进制度型开放作为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重要内容。

第三,要进一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经过多年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经贸合作平台,其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展现出强大的吸引力。我们要顺应低碳化、绿色化、数字化等发展趋势,提高“一带一路”项目建设的质量,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

第四,要更好发展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等开放试验区、功能区。我国大多数开放平台都具有区位优势、发展基础好、开放意识强、防控风险能力突出的优势,更好发展开放试验区、功能区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

放和开展国际经贸合作的有力抓手。要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进一步加大授权力度,鼓励开放试验区、功能区对标先行,发挥自身优势探索差异化特色发展的路子,高质量打造我国新时代改革开放试验区、国际合作竞争新高地、转型发展先行区。

第五,要发挥广交会、消博会、服贸会和进博会等对促进贸易的重要作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国克服困难,创新举办方式,推动四大展会成功举办,在特殊时期促进了贸易洽谈和贸易新业态发展,增进了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恢复贸易的信心。在这方面,我国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和广泛深入应用也为此提供了更好条件。面向未来,我们既要有关抢抓机遇的意识,也要有风险防控的意识,使这些展会发挥出更大作用。



本版编辑 梁笑语 李子娇 美 编 王子莹
来稿邮箱 jjrbl@sina.com